



# 贪腐之风搜刮国库民脂

本报评论员:余凡

11月下旬,海洋及渔业部长埃迪(Eddy Prabowo)及涉案人员被肃贪局(KPK)拘留的消息,引爆了全国各类媒体。因涉嫌虾苗(baby lobster)出口特别准证的贪污案也波及政党高层,总统指派卢胡统筹部长兼掌该部事务的绩效还有待观察;而肃贪局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进展,以及将由何人填补海洋及渔业部长的空缺,成了社交媒体及民众热议的话题。这位出身“大印尼党”(Gerindra)的部长,让其政党蒙羞,让国家、政府及人民倍感失望。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盘网》(KOMPAS.com)报道,肃贪局于12月5日对社会福利部(Kemensos)的一名官员进行

现场抓捕(OTT),肃贪局长费尔里(Firli Bahuri)对记者宣称:“的确,周六凌晨两点,肃贪局已经对被调查人进行抓捕。”“那是社会部掌管福利补贴(Bansos)签发承诺书的官员(PPK)。”该官员被怀疑接受供应商(vendor)们的馈赠,因为在防治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补助(PBJ Bantuan Sosial)项目中得到该官员的特别关照。局长呼吁大家给予肃贪局一些时间以便作进一步的调查。

翌日,事态有了人们普遍预料的发展。《罗盘网》6日宣称,肃贪局已于周日凌晨3时许正式拘捕了社会福利部长朱里亚利(Juliari P Batubara),他被控涉嫌贪污防治新冠疫情(Covid-19)的社会补助金(Bansos)。穿着黑色夹克、褐色

长裤,戴着口罩的部长迈上肃贪局大厦的石阶时,被两旁的记者们争着提出一些问题,但他只是挥挥手,默默走入大门。这位来自民主斗争党的部长在数位肃贪局干员的陪同下,走上二楼接受调查。

肃贪局长表示已有5人因相关事件被刑拘、审查20天,尚有一人还未归案,希望嫌犯在获知信息,或亲属通知后,尽快到肃贪局自首,否则将依法程序发出通缉令。肃贪局在突击检查行动中,于几个处所缴获7个行李箱,内藏约值145亿印尼盾的各国货币。

当国家政府及无数人民面对疫情的侵袭、忍受经济的困顿时,无数负有使命感的国家栋梁、医护人员、慈善机构都奉献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有的甚至牺牲了

宝贵的生命。回顾这一年,有多少私欲熏心的党政要员、裙带财团却昧着良心、恬不知耻地贪渎国家财产、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个人或集团利益,真的让人拍案嗟叹。唉……国之不幸!

《平台网》(Tribun)报道,“第一电视台”(TV One)政论节目ILC主持人卡尔尼(Karni Ilyas)与前BNN局长果立斯(Gories Mere)因涉及NTT省西芒伽莱县(Manggarai Barat)国家资产贪污案,2日被NTT省高级检察院(Kejati)传唤,但他们俩均没有到场接受讯问。

因为该案关系着价值约3兆(triliun)巨款的国家资产,引起各界的密切关注和评论。检察院已对NTT省古邦市(Kupang)及县乡的40名知情人士进行调查后,目标已指向更

高层的人物,并已列为“特别刑事案”(Tipidsus)深入严办。一位在电视政论节目中中标榜国家权益、言论民主的资深媒体人,竟也涉嫌贪腐?但愿检察院能查得公开、彻底。

最近,社交媒体上又刮起了一阵风暴,缘首都特区的议员(Anggota DPRD)正筹划明年的财政预算,他们已与阿尼斯省长取得默契,计划让议员每月的收入飙升约4倍之高。Cokro TV于12月3日播放阿德(Ade Armando)及几位名嘴的评论视频,谈起在2021年的“年度工作性能计划”(RKT)已经写入让雅加达首都特区的106名议员每人每月有7亿盾包括底薪、津贴、出勤费等的总收入,并由省府设法每月拨付该笔“特别预算”。

阿德评论:“那个总数实在太棒了,每位议员每月将获得7亿盾,或者扣税后实得6亿盾。其实议员们的工作效率远不达标。”很多议员其实刚就职一年,这事件的败露也揭开了他们贪婪的面目,根本不以国家、人民为重。“如果让我用粗暴的话说,他们正在计划搜刮人民的财产。”阿德接着说,所有各党团的议员大多都默许这个计划的进行,他们其实也明白这是省长因内政部长的“罢免”威胁,为安抚议员,免被弹劾而抛出的。

让人庆幸的是,首都议会中“团结党”(PSI)的年轻议员,顶住里里外外的各种压力和引诱,毅然拒绝滥用职权与当政者沆瀣一气,他们是人民的脊梁,是国家的希望!



巴中55届:陈用烈

陈用烈 1937年生,1956年从印尼回国,1962年北京大学毕业,1966年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研究生毕业,1988年获瑞典皇家工学院博士(PhD)学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1994-1997)、高分子研究

所所长(1991-2001)。曾担任广东省归侨专家联谊会副理事长(1994-1999)。从1987年开始担任印尼雅加达华中巴中广州校友会理事,2005年至2008年担任会长。

最近看到梁文道写的一篇散文《瑞典之谜一种——了不起的宜家》,里面说:“书迷大抵到了哪里,只要看到有书都会忍不住拿下来翻一翻。所以我在逛宜家私人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他们放在书架上用作装饰的书。这么多年以来,无一例外,那些书全都印着瑞典文,我当然不懂。”“...宜家讨厌向任何国家的固有传统让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它都只卖简洁现代的北欧家具,店里只提供瑞典小吃。连麦当劳在香港也很

## 瑞典文

顺应市场地推出了〈照烧牛肉汉堡〉的时候,宜家的家具依然叫做GUSTAV、TECKEN和TAJT,一堆你甚至无法发音的瑞典文。”我虽在瑞典呆过三年,却从来没有去过逛过宜家(IKEA),当然到香港时也不会去那里,因为无此需要。但对梁文道所说的瑞典人对其文化的执著却有难忘的体会。

80年代初,我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工学院做访问学者,行前曾告诉我做研究生时教我英语的黄葆同院士,他们说瑞典的现任工程科学院院长是在美国时的同学,让我去时带一些茶叶送给他。不久,这位院

长的秘书打电话来说,院长刚刚访问中国回来,要举行一个答谢家宴招待中国驻瑞典大使,让我也参加,并告诉我当日下午会派车到我住处来接。那天下午我从工学院搭乘郊区火车回住处,不料车到站时竟不停车,一直给拉到离住处好远的地方(Taby)才停下来。等我再返回到住处时,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只好打电话到院长家道歉,表示无法赴约了。他说你就打个出租车来吧,我来付车费,晚些没关系,我们都在等你呢。房东赶紧给我搞了一些她院子里的花让我带去,我到时所有人都到齐了,搞得我

非常尴尬。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列车的旁边是立着一块牌子的,但上面只用瑞典文写着:“TagetstannainteföreTaby”,意思是:此车在Taby之前不停车。

现在我们国内大城市中的公共场所到处都可以看到英文,广州的车上还有英语报站,着实让不谙中文的老外方便不少。奇怪的是,瑞典的英语非常普及,你到哪里都可以用英语和人交谈(除少数老年人外,但他们会的语言已经超过了)。只好打电话到院长家道歉,表示无法赴约了。他说你就打个出租车来吧,我来付车费,晚些没关系,我们都在等你呢。房东赶紧给我搞了一些她院子里的花让我带去,我到时所有人都到齐了,搞得我

IKEA的例子和我的经历说明瑞典人对保护他们的文化是多么地不遗余力了。他们鼓励外国人学瑞典语,即使是短期停留的,去上瑞典语课可以拿到补助费,所以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去学,那个补助费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他们又非常尊重外国人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意愿。我认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的小孩子不仅几乎是免费上托儿所,还可每周二次由政府出钱雇请教师给他上中文课。同样,如果是西班牙的孩子则可以上西班牙语课。像这样友好地对待外侨,甚至是短期居留的外侨的,恐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这恐怕应该算作另一种瑞典之谜吧。

写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 两度结缘,情牵一生

我与国际日报 廖省:苏歌



我与《国际日报》有幸再度结缘,纯属凑巧。事缘两年前写了一篇缅怀吴炳贤(白羽)老师的短文,有幸被《国际日报》破格刊登,获乡亲学友好评,遂令我萌生了重新订阅的念头。

重启每天清晨等候精神食粮的驾临,先睹为快、品天下事的日子,为枯燥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而与《国际日报》首次结缘,则是近二十年的事了,那一天到城区办事,我所任职的公司客户李荣霖先生是《国际日报》的忠实读者,办完正事后,在他店里边读报边聊时事的情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不久后,公司在会客室多加了一份《国际日报》,供客人在等候时阅读。午休时间,我也经常翻阅,很自然地也成了该报的“忠实读者”。

此报内容丰富多样,举凡本国时事、国际新闻、华社动态、副

刊文艺、体育健康等等,应有尽有,真可说是“一报在手,能知天下事”也!

2004年8月,在报上看到中国长春师范学院的孟陶宁老师来本市开办为期四个月的“第一届国外汉语教师培训班”,我即刻报名参加,下班后赶去上课,坚持修完课程,获益匪浅。

退休后,为节省开支,没有订阅日报,只是零敲散打,在想看的时候才去买一两份来读。

大多数人订报,《国际日报》是首选,除了可读性高,其版面也较多,看过的旧报纸用来打包,废物利用,绰绰有余;至今,旧报纸已在我的书房堆积成高高的一叠,待有暇时才整理,把需要的资料剪报留存,其余的都送去环保回收站。

在日报上偶尔读到一些错别字,窃思编撰工作繁重,有点疏漏在所难免,相信是笔误吧。

2020年5月4日读到一篇文章《用〈易经〉的干卦和坤卦导引人生》,感觉疑惑,随即请教陈诵林兄,他说:“‘乾坤’两个字,繁体及简体都应该这么写的。我想也许文章原文是繁体字,当编撰者在电脑里把它转换成简体字时,把‘乾’字被转化成‘干’字。”编辑部于两日后刊登更正启事。

虽说是无伤大雅,但笔者斗胆建议编撰者在“校对”这一方面多加注意。

最后,衷心祝愿《国际日报》承担起时代寄予的重托,与时俱进、越办越好!

清晨,我们七个小胖子欢快地奔跑在从菜地回家的路上。我和三个外甥女(三岁到八岁不等),追着三个十岁到十三岁间的外甥奔跑。我们跑得气喘吁吁。语言完全模糊在风里,只有笑声像一串串风铃散落乡间田埂之上。

虽然田地不再翠绿的稻浪和玉米,而是水稻割去后留下苍黄的梗,稍显清寂,但我们的笑声和吆喝声,就像秋天的小麻雀的欢歌,吵醒了土地里打盹的蚯蚓,泥巴里酣睡的泥鳅,还有窗下伸着懒腰的童子和老人。

我们摘回来了青椒和辣椒,三个外甥说要吃辣椒炒肉就来就馒头吃。两个稍长的外甥做饭都很娴熟,一下子一盘辣椒炒肉就出锅了。准备好的馒头,有方的有圆的,有荞麦的有紫薯的,十分丰盛。馒头刚出锅,“我要小的方形的,像车子可以开。”“我要紫色的馒头,和我的裙子一样的颜色。”“我要甜的”.....几个外甥女忍不住围着馒头喊着。大手与小手,你拿一个大的,我拿一个小的。我们七个人排排紧挨坐,马上开吃起来。汗滴如断线的珠子,在几个外甥发尖滴落。而鲜红的腊肉还是和小时候吃过的味道一样,有着柴火和冬天交错的味道。刚出锅的馒头,那让我们踏实和雀跃的香味,让三岁的小外甥女开心地跳着拍手。整如花香让蝴蝶起舞。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说笑,仿佛碗中的美食都有了笑声和欢呼。

“四姨,你工作的那个城市,是不是也总是这么热,也常常吃辣椒?”最淘气的外甥圣杰问我。“是啊,我们吃辣椒,但是没有腊肉。有牛肉,但是不如你做的好吃。”我一边吃着一边答道。“那你常回来,我经常做饭给你吃啊,我还会做意大利面,还有炒土豆丝,还有下面条。不过我最拿手的还是西红柿炒鸡蛋。”坐我旁边的十岁大大男孩圣杰,一边擦汗,一边略带骄傲地向我说道。

“你看你,吃着东西,还流口水。来,给你擦擦。”圣杰说着。他正要拿纸帮我擦,我猛然抖了一下。哦,原来我刚在梦里。定了定神,才知道此时我还在雅加达。原来刚才我在书桌边打盹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流口水的是我自己。那时然而我嘴里仿佛真有辣椒,腊肉和馒头的味道。而圣杰那活泼的眼神和骄傲的神气,就如眼前屏幕播放的电影,清晰在我眼前。

此时我不禁想起三个外甥。十三岁的康康,黝黑圆脸,常带一份腼腆,我在家的日子,我们一起做家务。洗碗扫地煮饭,他比我更认真。虽然不喜欢念书,但作业却做得很认真。他还非常勇敢,俨然一个小男子汉。有一次我们在欢乐谷的鬼屋里,我害怕得腿软,他竟然

休假回家,晚上他瞌睡如啄米的小鸡,还是要等我一起上楼,说一个故事,才肯回房睡去。白天总是缠着我,要和他说不着边际的事情,而我从不拒绝,一天到晚我们都腻歪在一起,说东道西,不着边际。

一年多未见,我已经抱不住他们,看着他们渐渐高大的身影,思念经不住蔓上心扉。我真渴望多些日子可以和他们的时光交错在一起。

如果说我外甥的身影渐渐高大,那爸爸的身影则日渐瘦小。在我们家,我们兄弟姐妹很少爸爸温柔说说心里话。但今年在海外,爸爸已经打了很多次电话来问我几时可以回家。声音听起来十分温和可亲。但我听得出来,爸爸的声音有些落寞,可能在孩子们飞出去的日子,

**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总会**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Indonesia  
2020抗疫有奖征文入围作品

## 秋梦

印尼中商会: Ariel Luo

像一个男孩,一路拉着我走完那段诡异曲折的路。康康也常陪爷爷一起下地,放牛喂鸡,他都乐此不疲。而十二岁的圣杰,天不怕地不怕的淘气小子,天生长着西北大男孩的模样。他最喜欢拆东西,家里电视机和手电筒,都要打开看个究竟,柜子翻一遍又一遍,仿佛里面藏了宝藏。这自然招来爷爷奶奶不少责备。虽然淘气,倒也灵敏,隔壁家小孩数手指很久的数学题,他看一眼基本就能给答案。玩羽毛球的时候,即使输了一百零一次,最小的外甥,十岁的威铭,从小瘦如面条,现在长得圆乎乎,十分可爱。常嘻嘻哈哈,少有正经时候,却也最粘人找人疼爱。在他小时候,每逢我

子,时光似乎犹如秋日的田野,总显得清寂。而日渐年长的他,少了年轻时燥气,慢慢开始思念起在外的子女。我不禁想起秋天的残荷败藕,和风中落寞摇曳的几多荷花,那是四季中的秋,整如眼下爸爸的秋天。我多么真诚希望,在家乡思念儿女的老父亲的秋天,拥有自己别样的色彩和韵味。

也许,我们不曾清楚地知道血浓于水的亲情究竟有多深,但眼下想和家人聚在一起的心情,就如伦敦街头的雾,弥漫在我整个胸间。这秋天打盹的梦,是温暖的思乡梦,是看穿秋景的伤怀梦,也是漫漫人生路中让人铭记的一个秋梦。

作者单位:  
CEECGPEC Indonesia Projects